

世界禁书文库

SHIJIJINSHUBAIBU

世界禁书百部

他人的血

远方出版社

世 界 禁 书 文 库

他 人 的 血

[法] 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 著
周知明 译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
献给
娜塔丽·索罗金娜

任何人都应对别人负责。

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

他人的血

他打开门，所有的人都盯着他。

“你们要我怎么办呢？”他说。

洛朗跨坐在炉前的椅子上。

“我有权利知道明天上午的事的情况？”洛朗说。

明天。他环顾四周。洗涤剂和白菜汤的气味在房间漂荡。马德莱娜吸着烟，两个胳膊肘撑在桌布上。德妮兹前面放着一本书。他们活着，对于他们，漫漫长夜终究会结束，黎明会到来。

洛朗注视着他。

“不能等，”他温和地说，“我应该八点钟去那儿，假如我去的话。”

他认真得像对一个病人一样地说：“当然。”

他知道他必须回答，然而他没能这样做。

“听着，你醒后来叫我，只要敲敲我的门就行了，让我思索一下。”

“就这么定了，我六点左右敲你的门。”洛朗说。

“她怎么样了？”德妮兹说。

“她现在还睡着。”他说。说完向房门走去。

“有事叫我们，”马德莱娜说，“洛朗要去休息了，我们整夜都在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他推开房门，毫不犹豫地走过来。只见她双眼紧闭，喘气

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

声从唇间发出。被单被翻滚着。被单被她翻腾得厉害，虽是一息尚存，但折腾得厉害。因为她痛苦极了，濒临死亡，恐怕连拂晓都过不去了。是我害的。我先害了雅克，现在是海伦。因为我曾经不爱她，因为我曾经爱过她，因为她近在咫尺，因为她远在天涯。因为我存在着。我存在着，她呢，是那样自由、孤独、永恒。她顺从着我的存在，却未能逃脱我存在的意外的事故，在相继而来的时间上任意漂荡，在命运之链的尽头，被流弹击中了心脏。金属的严酷存在，我的存在，她的死亡。因为我在那儿，不可捉摸，难以避免，没有道理地存在着。不存在是最好不过了。首先是雅克，现在是海伦。

外面是沉沉黑夜，没有路灯，没有星光，悄无声息。一队巡逻兵刚刚走过。现在，再也听不到有人过路的声音了，街上空旷荒凉。高级宾馆和政府各部大门前卫兵在站岗。一切照旧。可是这里却出事了：她正走向死亡。“先是雅克。”仍然是这一成不变的话语。在这难熬的黑夜中透过其他话语和对往事的回忆，最初的议论展开了历史画卷。它以一种特殊面目出现，仿佛发生其他事情，仿佛我一生，一切都未被安排好，在一切人类命运之中都孕育着绝对的腐败。这种绝对的腐败存在在我的出生中，存在在垂死的人的昏暗房间里和气味之中，存在在每分钟和永恒中。今天以及在任何时候，我在那儿，我曾经一直在那儿。过去，没有时间。时间一开始，我就在那儿，永远永远，除了自己的死亡之外。

他是在那儿，可他原来不知道。现在，我看见他倚在走廊的窗户上。但他不知道。他只相信世界是唯一存在的。他望着污浊的玻璃窗，不断升腾着油墨味和尘土味，这是别人工作的气味。旧橡木家具被阳光照射着，街上的人在绿色灯罩的暗淡

他 人 的 血

光线下感到窒息。整个下午都响着机器单调的轰鸣声。有时他离开了，有时他却关天地木然地呆在那儿。他的眼睛见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鼻孔嗅到的，都充满着懊悔。在污浊的玻璃窗下，烦恼凝滞在表面；在这间豁亮的长方形房间里，内疚的气氛在缭绕。他毫不知情，工人们只要抬头，就会透过窗子的小孔，发现这张资产者后代的清秀而智慧的面庞。

蓝色地毯柔地衬托着他的面颊，有着铜器反光的厨房弥漫着熔化的猪油香和焦糖的味道，客厅里传出时断时续的像丝绸在摩擦那样的谈话声。在夏日的花香之中，在初冬劈啪跳跃的火焰里，责备在不停地徘徊。只有度假才能忘记他。看到满天星斗落下，毫不内疚，苹果被牙齿咬得嘎吱作响，淡水打湿了赤脚。但是，当人们一回到散发着香气、四壁都是白围子的房间，当人们摇动樟脑味很浓的帷幔，会看到他仍然安详、完好无缺地待在那里。冬去春来，景色变化无穷，在切口烫金的书中，新的冒险故事出现在眼前，然而，不断减弱机器轰鸣声。

气味从阴暗的楼的底层渐渐弥漫到整座房屋。“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你的房间的。”几个字母刻在房屋前壁上：“布劳马，印刷厂主的儿子”。父亲迈着稳健的步履，从车间来到大房间。心绪平静地呼吸着弥漫在楼梯上凝滞、混浊的空气。伊丽莎白和徐宗也并不怀疑什么。她们在她们房间的墙上挂上版画，在她们睡的沙发床上安放沙发垫子。然而他的父亲了解，对这一点他相信，这不安会使艳阳天黯然失色。对母亲来说，闪亮的地板、丝织帷幔和高级毛制地毯，都流露着内疚。

她想可能是她曾在某处，在陌生的面孔中遇见过这种内疚。它在她的皮大衣下，在她熠熠闪光的裙子下，紧贴着她小

巧而丰满的身躯，她把它带到她的所到之处。她总是带着歉意，也就这样，她对佣人和普通售货员讲话总是非常客气，她走起路来像小跑似的，蜷缩着身子，仿佛还要缩小她占据的空间。他本来想就此询问她，可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，不好开口。一天，他想从楼梯上的人谈起，可她马上干脆地说：“不能这么说，他们并不那么厌烦，习惯成自然嘛。再说，在生活中，大家也是不得不做一些烦人的事的。”他就没话可说了。她的话没有多少分量，大家都这么认为，她仿佛是在一个理直气壮的、然而又吹毛求疵的证人面前讲话，因此必须避免争吵。然而当她兴致勃勃地为女厨师的孩子裁剪衣服时——她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去市场买一件——当她通宵修理女佣人缝补得难看的东西时，他好像了解了她。“真是荒谬绝伦，没有道理。”徐宗和伊丽莎白用谴责的口吻说。她并不想为自己辩解。然而从早到晚，她不停地东跑西颠，推着转椅上的年老而四肢瘫痪的女管家，一推就是几小时。她和她的聋子表妹聊天。其实她并不喜欢老管家和表妹，也不是竭尽全力帮助她们，只是由于闷闷不乐的气氛在整座房子里弥漫的缘故。

有时，她带让去看望穷人，这是由圣诞树和吃点心的、穿戴整洁的孩子使她想起的。他们对漂亮的长毛绒狗熊或干净的小围裙客气地致谢，他们才不是不幸的人呢。蹲在人行道上的衣衫褴褛的乞丐也无忧无虑。他们翻着白眼，肢体残废，用鼻子吹奏金属笛子，在大街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像沙漠中的骆驼，像一个中国男子梳着辫子。而我们听到的那些富有诗意的流浪汉和感人至深的弱小孤儿的故事，总是用喜悦的泪水、紧握的拳头、洗净的衣服、金黄色的面包做结尾。这一切表明贫困只是为了得到安慰，为了让富人的孩子们高兴地施舍才存在着。

他人的血

让贫穷困扰，可是却有另外的东西，他知道，对此切口烫金的书里没有讲过，布劳马先生没有讲过，这大概是不该讲的吧。

我在八岁的时候，一次被震动。那时，我正在走廊里读书，母亲回来了，带着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表情：责备而又含歉意的表情。她说：“路易丝的孩子死了。”

我望着弯弯曲曲的楼梯和铺满石板的走道，许许多多同样的门开在这里。妈妈对我说，每个门后都有一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。我们走了进去。路易丝拥抱了我，她的面颊柔软而湿润。妈妈坐在床上，在路易丝身边轻声和她交谈。旁边的摇篮里躺着一个面色苍白、双眼紧闭的男孩子。我的目光停留在红色方砖地上，停留在光秃秃的墙上，停留在煤气炉上，我终于控制不住哭起来。我哭着，妈妈交谈着，孩子死去了。我把攒的钱全拿出来，妈妈整夜整夜地陪伴着，可他还是死了。

“这孩子怎么了？”我父亲问。

“他陪我一起去路易丝家了。”妈妈回答。

她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，但她还想夸张一番：“脑膜炎，折腾了一夜，到早上小家伙的躯体就僵硬了。”爸爸边喝汤，边听她讲。我是吃不下去的。那边，路易丝在哭泣，她茶不思，饭不想。无论什么也不能把孩子还给她，永远不会了。什么东西也不能改变这玷污世界的不幸。

“喝你的汤吧，”父亲说，“别人都吃完了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

“强吃一点吧，我亲爱的。”妈妈开口了。

我把汤匙放到唇边，继而又放回盘子里，一看就不想吃饭了。

“我吃不下！”

“听着，”父亲说，“路易丝的孩子死了，这是很使人难过的。我也为她伤心，可我们总不能难过一辈子吧。好了，快点吃吧。”

我吃了。这严厉的声音顿时使我像被钳子夹住的喉咙放松开来。我感到热乎乎的汤从喉管滑下，每吃下一勺，这气味太恶心了，比印刷厂的气味还难闻。可是，喉咙毕竟松开了。不会一辈子这样下去的。今晚直到天亮前是这样，可能还得几天。不会一辈子这样下去的。反正这是她的不幸，不是我们的不幸。是他死了。他们让他躺在凳子上，他领子撕破了，面部的血迹凝固了。这是他的血，不是我的血。“我永远忘不了。”马塞尔心中也在向他呼唤：“永别了，聪明的小脑袋，小马驹，乖孩子；永别了，你那欢声笑语，你那有神的眼睛。”他在我们生活的旅程中安静而又奇怪地死去了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时时想起他的死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想起它，可它已不存在了。对于他这死去的人来说它从未存在过。我们不会一辈子这样的，几天都不会，连一分钟也不会。在这张床上，你是那样地孤独，我只能听见你双唇发出的喘息声，而你是听不见的。

汤被喝光了，晚饭也吃过了。现在他蜷缩在三角钢琴旁边。玲珑的糖壳闪烁着火焰般的光泽。冰冻水果，在糖壳下闪闪发光。柔情而妖艳的夫人们，像小火炉似的妩媚地微笑着。他望着他的母亲：她并不像这些香气氤氲的仙女，而是身着一条无袖黑裙子，她那像裙子一样乌黑的头发盘卷在头上。在她面前，人们想不到鲜花，想不起丰盛的糕点，想不起贝壳，也想不起浅蓝色的卵石。她是一个存在，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人

他人的血

的存在。她穿着小巧玲珑的缎面高跟鞋，在客厅来回走动，她也笑了。她竟然也笑了。刚才这个痛苦的面孔，这个在路易丝耳边不停唠叨的声音，现在变成了微笑。不会一辈子都这样的。路易丝的小孩曾死命地抓着地毯，路易丝的小孩死了。他竭力地凝视着浮现在眼前的情景：路易丝坐在床边哽咽，而他不再哭了。他透过这固定而又透明的景象，看见了眼前这些淡紫色的、绿色的、玫瑰色的裙子。一种欲望产生了：真想咬一口这鲜嫩的胳膊，让头钻进她们的头发之中，像揉搓花瓣一样地将这轻而且薄的丝绸揉皱。路易丝的孩子死了。死就死了，这并非我的不幸。并非我的死亡。我双眼紧闭，一动不动，我回忆的是我自己，他的死闯进了我的生活，而我是不会进入他的死亡的。我钻进钢琴下面，我在床上不停地流泪，直到昏昏睡去，因为有一种东西随热汤流进了我的喉管，这是这是内疚所不能比拟的东西：我的错误。在路易丝哭泣时我却微笑的错误，我流的是我的眼泪而不是他的眼泪的错误，作为一个他人而存在的错误。

他是不理解这一切的，因为他太小了。他想到错误出其不意地进入他的躯体，因为他的抽搐的手指松开了，因为他的喉咙畅通了。他并没有去想象这错误，是充满我肺腑的空气，是流动在血管里的血液，是我的生命的热力。他想到，如果他不强使自己这么做，他永远也不会尝到这如比丑陋的滋味。他这样做了。他端坐在他的小学生课桌前，天真无邪的目光停留在平展的书页上，眼睛眨一眨地，像未来一样单纯。一张白纸，一块白布，千里冰封、闪烁着未来革命之光的大地。马塞尔扔掉了他的笔，这是雅克脸上的血；这是为了我们避免流的每一滴血，是为了我们流过的每一滴血，沸腾的血。这是你的血，

它在白棉絮上、纱布上是那样鲜红，它是在你鼓胀的血管里缓缓流动的血。“她过不了今夜了。”没有鲜花，没有柩车，我们将把你掩埋在地下。我手上的污迹，我们心灵上的污迹，恰如一位幼稚的用粗细笔划描绘着什么的聪明的孩子的前途。他不懂得揣摸。他不知道他有多大分量。这纯洁得几乎透明的人在洁白的纸页前，向着美好未来理想。

她讲话是那么理智，好像她从未打过寒噤，好像她从未踟蹰过。她说，贫困和奴役，武器和战争，像令人心碎的激情，像闷闷不乐的误解一样，正是愚蠢的表现，这愚蠢是人类不可思议的。只要人们为所欲为，一切都将面目全非。对他们的疯狂我感到愤慨。我想我们应该手挽着手，走遍全城。她穿着小巧的半高跟鞋，碎步疾走。我呢，我要满怀少年的激情拉她向前。在空地上，我们使行人停步，我们走进咖啡馆，向群众发表演说。这一切是完全可能的。在满是塞维利亚人的街道上，在政变发生的那个炎热的早晨，人们突然惊惶失措地跑起来。爸爸夹杂在人流中间，拖着伊丽莎白和徐宗就走。她停住脚步，为了阻止人群盲目地前进，她伸开她的双臂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认为，如果爸爸不紧拉她的手腕，如果他也伸出他那男人的长胳膊的话，被制服的群众会恢复他们平静的步伐的。

可是父亲是不想阻止人流的盲目行进的。在嘈杂的人群中，他很有尊严地跑着，任何劝告也挡不住他顽强的步伐。当我天真地询问他时，他却露出笑容了。接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以一种辛酸的自豪感回忆起他的劳动和有节制的生活。他认为他有权得到某种享受，他越是不考虑享清福，这种权利就越是有把握。他白天上一天班，晚上抱着厚厚的书看，边看边记笔记。他不善交际，几乎从不出门。他吃饭和喝咖啡总是

他人的血

毫不在意，却把雪茄烟、勃艮第葡萄酒、法国阿玛聂克 1893 年产的烧酒视为使他感到安慰的唯一而必要的荣誉。

“水平总是从底层开始，”他向我解释道，“你提不高群众的水平，有优秀分子也是白搭。”他的声音是时断时续的，没有辩驳的意味。然而他的一种可怕的恐惧从他的眼睛深处流露。我沉默了。我渐渐地预感到这样的真理：他像嗅着熏香一样，愉快地呼吸着世界的腐败气味。因为不只是这座房子，整座城市，整个大地都受到了侵蚀。晚上，在地铁里，是同样使我窒息的焦虑。男人们将手平放在膝盖上，妇女的眼睛暗淡无光。列车的颠簸将人们的汗水和痛苦在沉闷的空气中搅作一团。火车通过一个瓷壁大厅，那里五颜六色的广告反映出人们用蝾螈炉、吃肥肝罐头的日常生活的面貌。然后火车钻入黑暗的隧道。仿佛这一群人那么疲惫不堪，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，我的心里一阵难过。我想起和朋友马塞尔一起看过的一个电影：一座城市陷落到地底下，那里的人们在黑夜里、在痛苦中化为灰烬。而另一个傲慢的种族却在白色的露天坐位上，呷着咖啡，沐浴着灿烂的阳光。历史一直是在一种吞没、一种抗争而告结束；或者在打碎瓶瓶罐罐的混乱之中，以光彩的和解而告结束。我想：“为什么这些人不反抗呢？”星期日，我常常拖马塞尔去欧贝维利耶和庞坦。我们沿着荒凉的城墙，沿着煤气贮存站，沿着工厂的烟囱，沿着发乌的砖房走着，一走就是几小时。在我眼前，生活画面就这样展现了，从早到晚，周而复始。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天。“他们习惯了。”他们习惯成自然的话，那就更糟糕了。

当我在她面前说出“革命”一词时，她的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你不过是个孩子，谈革命是无知妄说！”我想争几句，可

她制止了我，她的身躯被一种可怕的情感摇撼着。在生活中想改变世界的某种东西是狂妄的，如果我们避免触及它，那已经是够可悲的了。对于她内心和理智不赞成的一切：我的父亲、结婚、资本主义，她总是假装尽力支持。因为弊病并不在制度本身，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。应该把身子蜷缩起来待在一个角落里，缩得越小越好，这比堕落地前进、一切都接受要好些。这是谨小慎微！荒诞的谨小慎微！好像有一种遁世的办法，把门关起来，把嘴闭起来，然而我的缄默却是对秩序的呐喊。“你一言不发，那我去了”，或者“你一言不发，我不去了”。我的出现就是语言。前进吧，在黑夜的泥泞中前进。决定吧。我决定了你的死亡，我没有偿清债务。再有，我呼唤饶恕，却没有饶恕。啊！没有得到挚爱的人啊！假如我早些识破谨慎的陷阱，我会打开房门，向你伸出双臂，捧出我的心。我缄默着，全身发僵。“关于杀人的事，我连一手指也不动。”我身体的重量压在这大地上。你走向死亡。其他人身上伤痕累累，瘦得皮包骨头，濒临死亡的边缘。两百万俘虏在铁蒺藜网后瑟瑟发抖。小罗沙姑娘从窗户里跳出来了。后来在牢房中发现了她穿着衬裤被掐死的尸体！疯狂的行为！他的谨慎让他憎恨。他抬起手，抬起整个臂膀，愤怒地盯着他的母亲：“我要改变这个世界。”这是一种疏忽，一种失去理智的不谨慎。他想谈话，他要行动。雅克躺在凳子上，衬衫扣子被敞开，他双眼紧闭，脸上斑斑血痕，已经凝结了。

可怜天真的好小伙子啊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他举起拳头。他在大合唱中唱道：“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。”没有战争，没有失业，没有奴役劳动，没有贫困。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死去，大地上一片欢腾景象。从思想

他人的血

上，打碎旧世界，然后，像孩子调整器械玩具零件一样，组装成一个新的宇宙，一片一片地。

“好了，我登记入党了！”在走进马塞尔的车间时我爽朗地说。

马塞尔放下他手中的笔，把画架挪到靠墙的地方。他的所有画布都面向墙，背面是粗糙的。

“自然，”他说，“应该走这一步。”

“假如我们连一个手指头也不动的话，你相信世界自己会变吗？”我说。

马塞尔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“对于这个世界，我没有什指指望。一塌糊涂，糟透了，我愿竭尽全力制作一个新世界。”

“可你的世界只存在在画布上。”

他神秘地一笑：“走着瞧吧。”

他见到了。但是这时候，他年轻，尽管他有疑惑不解的地方，他仍在希望着。我几乎每天都敲他的门，他有不能明白地接待我，有时毫无表情。他还是接待我。他本应粗暴地闭门不见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或者他大概懂得人们是不能让人家吃闭门羹的。我进了屋，雅克正坐在一张小桌前工作，他很像他的哥哥，只是他显得丰满、秀气些，不像他哥哥那么粗糙。马塞尔把一瓶质量低劣的烧酒放在桌子上，那桌子上满是仙人掌、贝壳、曼德拉草根，以及他闹着玩时用卵石、钉子、火柴和线头制作的拼花。在一个大口玻璃瓶里有一只海马：一个微小弯曲、带刺的黑身子，顶着一个高雅有趣的马脑袋。我们点燃香烟，聊起天来。我喜欢聊天。我精心选择着我的话：话头该把马塞尔引入我所急欲到达的这块纯洁的领地。雅克听懂

了。

他抬起了头。

“和无产阶级并肩战斗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我们并不知内情。”

“我们有和它同样的愿望。”

“才不呢，一个工人希望的是他的解放。你希望的只不过是他人解放。”

“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关键在于结果相同。”

“可是结果离不开为它而进行的斗争。黑格尔对此有过鲜明的阐述，你应该读一读。”

“我没空儿。”

我对他大讲玄妙的哲学有些不快。我原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然而他却无比热情地实践着。

“当然，人们追求是为了获得，”他说，“人们想获得的，是人们追求的东西。我不追求的财富不是我的财富，对于我来说，它不是财富。这是法西斯分子所无法理解的。我钦佩马克思，因为他要人们去索取而不是接受。只是你和我，我们没有什么可索取的。我们和这不沾边，我们不能成为共产党人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”

他非常气愤，耸了一下肩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笑了。仍是这么学生气十足。我不该笑：他至少知道他生活在地球上，知道他永远没法超越过自身存在的谜团。我从来也不知道我只是注视着没有任何懊悔的未来的世界。

而后，一天，我认识了我自己。我看到自己身体强壮，无法测量，和全家一起坐在饭桌旁，炒好的鸡蛋冒着热气，光芒映照在我剪裁得体的西装上和我漂亮的手上。我像雅克看我时

他人的血

一样地看我，就如同我在车间来回走动时工人们看我时那样看我。这就是我，布劳马的儿子。大众之下，盯住了我的发胀的面颊，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眼的存在物。

我的面颊整个上午都在发胀。“我要搞什么名堂？”在去餐厅之前，他用湿毛巾久久地擦洗他的脸，将眼睛闭上。

“妈妈好，爸爸好。”他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。

他俯下身子去吻他的母亲。

“我的天哪，你怎么啦？”布劳马夫人问，惊恐的表情呈现于脸上。

“哟，脸色怎么这样！”徐宗说。

他默默地坐下去，用手打开叠好的餐巾。

“你母亲问你出了什么事。”布劳马先生干巴巴地说。

“没什么，”用手指掰了一块面包说，“昨天晚上，我和同志们到蒙马特尔的一家咖啡馆去了，那里发生了群架。”

“什么同志们？”母亲说。

她像往常生气一样，脸微微变红了。

“马塞尔和雅克·勒德宇。”让说。

他不喜欢撒谎，他也怕脸红。

“那么，你在那儿挨了一拳？”布劳马先生慢条斯理地说。

他那敏锐的眼睛在夹鼻眼镜后边闪闪发光。

“是的。”他说。

他用手抚摸着肿大的脸。

“那家伙的拳头确像大头棒那样硬。”布劳马先生说。他用一种冷漠的表情专注地看着儿子，“你深更半夜到布里耶，在一群尖叫声中高喊《国际歌》的狂徒中间去干什么？”

血液涌上他的双颊，他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液。